

教育与共同富裕笔谈

[主持人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①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升人们的发展能力奠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本刊编辑部邀请了部分专家学者围绕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孙志军）

[关键词] 共同富裕；教育；收入分配；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分析框架与改革建议

杜育红，赵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了重大部署，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必须统筹协调好促进经济增长与全体人民共享增长成果的体制机制。优质均衡的教育既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

[收稿日期] 2022-04-06

[作者简介] 杜育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首都教育经济研究基地，电子邮箱地址：dyh@bnu.edu.cn；赵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首都教育经济研究基地，电子邮箱地址：zhaoran@bnu.edu.cn。

① 习近平，2021：《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第20期。

一、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成效。精准扶贫政策举全社会之力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经历了打破大锅饭与平均主义，鼓励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时期；经历了个人收入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时期；经历了初次分配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时期；经历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政策，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收入分配方面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021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80976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 12551 美元，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更需要不断完善收入分配机制，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深层逻辑，在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的双重目标。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研究核心思想的演变

二战之后的30年被称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30年，这些国家不仅在战后快速地恢复了经济的增长，而且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社会流动性增强。在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收入分配思想是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

1953年库兹涅茨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作的演讲中提出，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收入不平等必然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这被称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库兹涅茨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增长将使每个人受益。“经济增长的大潮会使所有船只扬帆远航”。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是，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收入不平等将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库兹涅茨的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人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在某一点达到峰值，然后逐步缩小，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得到解决。

库兹涅茨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外受到质疑。从那时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开始不断加大，不平等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经济总体上持续增长，但中下阶层的劳动者收入却长期得不到提升，甚至实际收入有的还出现了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触发了人们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在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资金救市，大批普通群众利益受损甚至破产的同时，华尔街的银行家仍然可以享受高额的奖金。这凸显了美国经济制度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美国的经济制度设计更多地保护了少数精英的利益，而损害了普通大众的利益。

对于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恶化，很多学者沿用了二战后个人收入分配的研究思路，解释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从人力资本角度进行的解释。《教育与技术的竞赛》是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高尔丁和凯茨通过对美国20世纪经济发展的分析，提出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于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带来的高技能与低技能供需变化导致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高技能人才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而在高技能人才的供给方面则相对不足，导致高技能人才工资溢价明显。

2014年皮凯蒂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构建了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统一起来的分析框架，通过对18世纪工业革命后近300年世界各国增长与财富分配数据的分析，发现市场本身无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从长期看，不平等会越来越严重。皮凯蒂认为应该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中心，

经济史就是资本、劳动、技术、人口等各种增长要素相互博弈的过程，而由于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必然导致资本在国民收入份额的比例不断提高，带来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皮凯蒂的研究在国外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实他对收入分配的分析框架，与国内收入分配政策的演变也是不谋而合的。国内的收入分配政策从最初强调劳动收入的分配，到后来不仅强调劳动收入分配，还强调要素贡献的分配。从单纯重视要素贡献的分配作用，到重点强调完善要素分配机制。从单纯重视劳动收入分配问题，到重点强调劳动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这些新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强调仅仅靠市场机制不能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且现实中也不存在理论上描述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现实中的市场是通过“人造”的规则运行的。规则的设计对于市场的有效运行，以及不平等问题解决都是至关重要的。

希瑟·布西布等主编的《皮凯蒂之后》一书从不同角度对皮凯蒂的研究指出了不足之处。第一，皮凯蒂的研究排斥了人力资本的作用，在计算资本时没有将人力资本考虑在内。实际上人力资本在解释劳动收入不平等、代际财富转移、家庭教育投资等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应该加强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不平等问题的研究。第二，皮凯蒂的研究对技术革命与全球化的影响考虑不够。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对不平等的影响与皮凯蒂所关注的因素相比，具有同样的影响力。第三，大公司越来越把工作外包引起了职场裂变，不同类型企业工资水平的设定存在明显差异。由全球化与工作外包带来的恶性竞争，使低端劳动收入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低端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从上述关于收入分配核心思想的简要回顾可以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使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同机制，也存在着使收入差距分化的机制。从皮凯蒂建立的统一了微观与宏观的分析框架，到皮凯蒂之后对技术革命、全球化、人力资本的强调中可以发现，不论是初次要素分配的机制，还是劳动收入的分配机制，以及二次分配的机制设计，都存在着非常多的着力点可以改进，进而可以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收入分配的改善。教育与人力资本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领域。

三、教育与人力资本作用于不平等的分析框架

人们通常对通过教育与人力资本解决不平等寄予厚望。皮凯蒂曾尝试提出人力资本上升假说，从生产技术要求工人技能不断提升的角度，提出

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会不断上升。但从经济史的数据看，这一假说没有得到证实。同样，教育的扩展也没有带来工资不平等状况的改进。皮凯蒂发现：“尽管教育体系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大规模的民主化过程，但工资不平等现象却没有得到改善，原因何在呢？最自然的解释是，不同层次技能的进步速度相当，造成工资层级的不平等被简单地向上平移。——换言之，教育体系的民主化并未消除教育的不平等，因而不能缩小工资的不平等。”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视教育与人力资本是未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的重要途径。因此，有必要在厘清人力资本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教育与人力资本作用于不平等问题分析框架，以便全面深入地理解教育与人力资本对于不平等的作用。

以往学者们多是从微观角度认识人力资本的作用，认为通过对教育等方面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升个体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收入，改善收入分配。但如果考察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就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与完善，从最初舒尔茨、贝克尔从个体劳动生产率提升角度定义人力资本，到卢卡斯、罗默从人力资本的社会效应与边际收益递增理解人力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再到赫克曼从非认知技能与生命周期的受益考察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的作用，人力资本的内涵既包含了宏观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劳动、技术创新等因素，也包含了微观个体收入分配中的劳动生产率与收入水平的提升。因此考察教育与人力资本对不平等的作用也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展开。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应该探讨个体劳动技能提升的人力资本对资本与劳动在收入分配份额变化方面的影响。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与特定的国际背景下，教育与人力资本提升个体劳动生产率对资本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如何？教育是否提升了劳动收入的占比？教育与人力资本对资本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有多大，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其次，在宏观层面上应该探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不平等的关系。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从宏观上提升了人力资本的价值，使劳动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进而有利于收入不平等的改进。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处理好人力资本、技术革命与不平等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既关系到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立，也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实现。

第三，在宏观层面上要关注全球化与产业链全球配置对人力资本与不平等关系的影响。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与产业链配置提高了全球生产的效率，改变了全球的经济图景。跨国公司通过零部件生产外包等方式，将产品制造配置到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改变了发展

的形态。对劳动力市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出现两类市场的裂变。这种全球化的生产链对教育与人力资本之于不平等的作用也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教育与人力资本的需求以及其作用于收入分配的机制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影响。

在微观方面，教育与人力资本对不平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收入的差异方面。这方面的分析要充分考虑皮凯蒂提出的教育普及化与民主化似乎并没有缩小个体劳动收入差距的问题。要更全面地考察教育、人力资本与个体劳动收入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微观层面应该区分教育人力资本的生产功能与筛选功能。教育可以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也可以作为重要的筛选信号帮助个体在各种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获得竞争优势。当教育被个体及雇主越来越多地作为获得竞争优势的筛选信号时，教育不仅不能促进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改进，反而会扩大个体收入不平等。

其次，在微观层面研究人力资本的有效测量及其收益问题。受制于测量手段及数据可得性等因素，以往很多研究都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毕业院校等作为教育和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更准确的研究应该使用可以作用于劳动力市场的教育结果作为人力资本的测量。有了更为准确的人力资本测量，才可能更准确地测量人力资本的收益及其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当然，各类教育及人力资本的收益率的测算是相关分析的非常好的工具。

第三，在微观层面研究新技术革命、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教育与技术的竞赛》中，高尔丁和凯茨使用高技能与低技能相对工资的变化分析了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当前，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对现实的经济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高收入群体收入快速增长的问题，中等水平技术工作消失的问题，都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挑战。应把握新技术革命的变化，进而有针对性地在教育与人力资本的供求，以及相关市场制度规则设计上，采取恰当的政策，更好地迎接新技术革命，更好地控制垄断力量，更好地构建健康可持续的市场，更好地通过新技术革命改进收入分配。

第四，在微观层面研究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一定是鼓励通过个人努力实现流动的社会。教育是促进这种流动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教育体系的设计应有利于弱势群体，有利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融合。考察教育公平状况以及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状况，对于通过教育构建更为公平，更具活力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在微观层面深入地分析教育发展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关系。实

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客观准确地分析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与结构，进而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合理地设计教育发展的重点，通过教育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要途经之一。

四、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几点初步建议

第一，大力营造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的教育环境，弱化作为筛选信号功能的教育取向。教育既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也可以作为社会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的筛选工具。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格局看，教育得到全社会的大力支持，是因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的作用。如果教育更多的是作为筛选工具存在，就不应该获得全社会这么大力度的支持。但在现实中，以应试教育为代表的教育功能更多地体现为教育的筛选功能，为筛选功能花费这么大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来说是巨大的浪费，更不用说，这样的教育不仅不能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会成为扩大收入差距的推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劳动人事制度过多依赖教育信号筛选作用的因素，也与整个教育体系过度强调竞争、排名、分流、筛选的积弊有关。构建促进共同富裕的教育体系，必须从劳动人事制度以及教育体系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改革，才有可能让教育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第二，建立正确的质量观，大力提升各级各类教育质量。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教育快速发展，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但教育的质量，尤其是适应产业升级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质量教育还非常欠缺。长期以应试与筛选为导向的教育质量观，使我们的教育在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在人文素养、健全人格、动手能力等人力资本导向教育最重要的方面严重缺失。促进共同富裕的教育一定是建立在正确质量观下的教育，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成为国家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基石。

第三，建立补偿性的教育体系，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公平发展。教育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学生的学业成就是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学生自身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环境与学生先天禀赋对学生学业成就影响非常大，如果对于弱势家庭的学生以及学习困难的学生不给予额外的补偿教育，教育的差距会随着教育层次的提升不断加大。从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的高度看教育体系的构建，建立补偿性的教育体系至关重要。当前，农村教育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应该给予更多的额外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一群体不被经济社会的发展排斥在外。

第四, 优化教育结构, 完善体制机制, 促进产教有机融合。产教融合作为解决学生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出口, 通过增加劳动工资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 促使劳动报酬份额不断提高。在宏观层面, 通过教育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结合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产业带动就业人员致富增收, 可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稳定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能力, 从而促进社会流动,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微观层面,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面临着资源投入不足, 上升通道狭窄, 难以吸收优质人才,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对脱节等困境。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的投入成本更高, 周期更长, 因此除加大政府投入外, 应激励学校、企业、行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共同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通过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 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 构建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的产教融合网络。在政策层面, 只有不断加强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整体性、系统性政策供给, 才能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方面的优势。

总之, 从经济社会发展与不平等的内在机制看, 教育是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所有样态的教育都可以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 只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生产功能的教育, 只有建立了正确质量观的教育, 只有对弱势群体给予补偿的教育, 只有形成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教育, 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

李立国

在中华文化中, 富裕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早在 2000 多年前, 有人问道孔子, 怎么才算是好的国家和国家治理, 孔子答曰: 富之, 庶之, 教之。意思是国家首先要富裕起来, 富裕起来人口也会快速增长, 必须同时发展教育来教化万民。中国古代的《礼记·礼运》对于理想的大同社会做了精彩描述: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 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力, 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 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作者简介] 李立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电子邮箱地址: liligu@ruc.edu.cn。

是谓大同。”《礼记》中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大同之世”，不仅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更要有良好的社会道德和精神境界。现在我国提出的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还要有精神富裕。仓廩实而知礼节。从历史经验看，在一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人们的生存问题还未得到真正解决的情况下，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不会太高。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精神层面。精神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首先体现在要通过教育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大学》开篇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通过个人的完善实现社会的至善。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培养“智、体、德”和谐发展的“完善的人”。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的重要内容。回顾人类思想史，特别是西方教育思想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关于人的发展问题，从古希腊的和谐教育论者到近代人文主义教育家，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始终是人们思考并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和实现路径。直到马克思，这一理想才从空想变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理论概括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实质和实现条件，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这一科学真理。由此，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人的发展的社会进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并确立了他们所理解的人的全面发展观——以现实的个人为发展主体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状况是由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的。因此，在探讨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把人类的发展历史同社会的发展进步历程密切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种科学的人的发展理念，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还为我们科学地认识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与规格指明了方向。

共同富裕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和社会基础，也为进行教育制度创新进而促进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以往理论的不同在于，他从分析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产关系入手，指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手段和途径，使之从一个浪漫主义的理想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关于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人们总是在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从事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在创造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同时,也使个体得到发展与进步。概言之,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是同向而行、齐头并进的。即没有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进步;而人的综合素质的不断提升和发展,又会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和形态,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它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需求去培养和造就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这些被教育培养的各种人才,则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改变教育存在的环境和各种社会条件,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发展。教育、社会与个体三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相互制约的运行网络,每一个组成部分既相对独立地存在着又彼此关联影响着。正确把握人与社会、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的过程中,发展教育事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教育振兴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物质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为建设富裕社会提供了人才与智力支撑。我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国人均 GDP 自 2019 年起突破 1 万美元,站在了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上。依据世界银行 2020 年国别收入分类标准,将各国或地区分为高收入国家(人均 GDP 高于 12535 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4046—12535 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036—4045 美元)和低收入国家(不到 1036 美元)。我国目前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预计到 2035 年,我国人均 GDP 将达到 2 万美元以上,稳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远景目标看,到 2049 年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的时候,人均 GDP 达到 5 万美元左右,到 2121 年建党 200 周年的时候,我国人均 GDP 进入到世界前 10% 国家的行列。实现这些经济增长目标,打好富裕的根基,需要付出多倍努力,需要不断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科技进步水平和全要素贡献率,要求继续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系统推进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解决好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支撑。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建立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体系。为此,必须重视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教育发展中,坚持教育公益性,实现教育公平而优质的发展,同时在教育过程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看,教育公平的实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

义的根本价值立场是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恪守教育的人民立场，在教育发展中就集中表现为教育基于人民、教育依靠人民和教育为了人民，通过发展教育事业，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如果社会不能为每个个体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个体就很难通过受教育而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难以实现其通过人才培养而促进社会发展的本体功能，也就实现不了教育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推动作用。让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追求的价值理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教育变迁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教育公平的奋斗过程。从让广大的工农群众都接受教育享有受教育权，到通过各种倾斜政策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再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人都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平等机会），无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尽管当下距离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历史和实践均证明，一切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党的领导下，缩小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城乡差距、校际差距和区域差距，已经在实施，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从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辩证关系看，二者是相互依存、密切相关的统一整体。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是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两个重要方面。如果不以公平为基础推进教育质量提升，优质的教育资源就只能仍然由少数人占有和独享，从而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而低质量的教育公平的实现，最多只是低层次上的平均和共享，本质上并不符合教育公平的内涵实质和价值追求。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的教育，必然是更加公平和更高质量的教育，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教育，使全体人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教育高质量发展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万海远

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当前我国发展阶段发生重要变化，党中央正式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强调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党

〔作者简介〕万海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电子邮箱地址：why842000@163.com。

中央明确指出，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基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共同富裕可以归纳为物质福利、基本公共服务、人的发展、精神文明等方面。这四个维度都与教育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教育既是居民物质福利的重要来源，也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核心内涵，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起点投入要素，更是中国特色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富裕是体现初期能力禀赋提升和后期结果干预的高度结合，体现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的有机结合，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既能体现经济效率也能促进社会公平，既能实现总体富裕又能达到共享富裕，因此是共同富裕的长期兼容性政策。

一、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发展逻辑

（一）教育是物质富裕的重要基石

共同富裕的根本靠发展，基础在教育，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发展，就不足以给共同富裕提供科技支持和人力支撑。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可以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教育既是国强民富的动力基础，更是全体人民共享富裕的内涵基础。建设广泛优质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居民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是缩小人力资本差异的重要落脚点，可以夯实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人力基础。

推进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是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构建婴幼儿生育、养育和教育政策体系，提升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促进义务教育优质资源均衡分配，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平衡发展，提升学校教育普惠性。同时，要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加大劳动者职业培训力度，开展岗前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转岗转业培训，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培训，实施专项培训计划，努力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人才。

（二）包容性增长的教育发展基础

共同富裕本质上包含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效率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的总体富裕，公平主要体现为收入分配的共享富裕，分别对应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收入的合理分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不仅要注重经

经济增长效率，还要更加注重对公平方面的强调和关注。其中，教育既是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是总体富裕的物质基础，同时教育又是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的技能基础，是共享富裕的根本保证。

注重包容性经济增长，努力方向是要找到两者能够相互兼容的政策工具，使得在发展中实现共享，并在共享中进一步推进发展。提升教育普及普惠性，不仅可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而且反过来会有利于促进劳动就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注重学校与终身教育的全过程，从源头上侧重教育技能水平的均衡提升，这是公平和效率的兼容性政策，也是长期共同富裕的根本来源。

（三）面向共同富裕的教育发展短板

对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当前教育领域仍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匹配的短板弱项。目前我国民生投入发展相对滞后，公平优质的教育服务投入不足，成为制约均衡发展的重要短板，也是人民不太满意的重要领域。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限制了教育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的能力。同时，教育在平衡性、效率性、与劳动力市场接轨等方面存在问题，限制了教育缩小收入差距作用的发挥，由此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制约因素。

目前我国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还在于城乡、区域和人群间不平衡，特别是农村、西部地区、低收入者的不充分发展，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城乡、区域和人群间的分配差距。长期以来，城乡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存在较大差异，农村人口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农村教育投入不大、教学质量不高，优质教育资源和入学机会的分配更不均衡，成为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主要短板。

二、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一）受教育权利与发展能力

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教育权是人民最为关注的权益之一。实现充分、公平、优质的教育供给是人的基本权利，更是社会和谐和睦的重要基础。促进共同富裕，关键是要提升个体发展能力，保护受教育权利，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需要进一步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共享性、公平性，并为全体成员的教育机会均等提供保障。尤其是，对学校教育采取有质量的综合性早期干预措施，已被视为根除贫困、保证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

这是既能实现发展又能促进共享的良好政策。

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奋斗，是通过人的能力提升来推进共同富裕，这在根本上还是要靠学校教育，通过教育让社会所有人获得必备的能力。人的能力提升包括过程与结果导向两个方面，对应教育机会与劳动过程两个方面。无论是侧重儿童早期发展的能力培育，还是注重劳动力市场中的过程均等，都是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推进的政策措施。保障全体人民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推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培训服务，是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二）精神富裕范畴

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仅能促进教育公平，更能为人们实现自身发展创造条件，从而给更多人创造美好生活机会。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是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全面富裕，而不是西方国家通过简单福利转移的方式来实现单维度的结果富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体现各个主体的自我发展，是回应全体人民精神需求的过程，故教育文化的作用就更加重要。

教育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因此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教育公平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文化繁荣为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教育文化提升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有利于达到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富裕。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有机结合，这些均与教育文化息息相关。

（三）人的早期全面发展

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也应包含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教育培训是个体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投入要素，也是生存与发展的必备基础。共同富裕目标应回归到人本身，要以人的全面发展进步来衡量，包含智力、健康、品质、素养等全方位发展。成年后个体能力相对稳定，短时间内很难根本改变。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应把主要措施前置到儿童早期发展上来，这需要推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和均等化，缩小个体间发展能力差异，使新一代劳动者具备符合时代要求的就业和创业能力。

教育均衡发展旨在加快建设优质公平的教育体系，并力求以良好的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为保障，全面提升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从而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即将迈入高收入阶段下，需要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应成为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从长期来看，要侧重各级教育均衡发展，促进人的早期发育和营养健康，从人的全面能力提升方面做

实长期共同富裕基础。

三、教育做实充分高质量就业

(一)生活富裕富足的来源

即便获得必备的人的发展能力后，共同富裕也需要充分、持续、稳定的高质量就业来保障。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推动共同富裕离不开充分就业。获得必要的教育水平和必备的专业技能，是稳定就业的基本要求。近年来，我们全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这要求各类劳动者具备适配未来的教育水平与技能训练。

一线产业工人面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但过去学校教育系统无法提供足够的终身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服务，使得教育供应链、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需求链存在脱节。这需要在政策上做好职工专业技能的教育培训，努力增强职工适应现代社会就业创业的能力基础，在培训过程中要增强创新意识，大力鼓励自主创业，由此满足现代终身教育所提出的内涵要求。

(二)居民劳动报酬的基础

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致富的必要前提，就是获得相应的教育水平。教育是稳定劳动就业和改善劳动报酬的来源，在教育和劳动技能不断提升背景下，目前一线劳动者还具有较大的工资合理增长空间。

教育质量提升是增加劳动报酬的重要力量，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政策工具。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人群，这需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各级教育投入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标准，兜住人民基本生活的底线。尤其是，要普惠性增加教育投入，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收入报酬，由此带动全体人民以辛勤劳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教育适配劳动力市场

提高劳动者技能，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从供给侧角度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开展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要素结构和使用效率，从根本上改善劳动力要素质量。尤其是需要进一步改革学校教育的专业设置，加强学校教育与市场企业的对接，培养能够为市场上可用能用的合格劳动力。

职业教育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企业保持良性循环、稳健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要素，是产业工人和低收入群体技能提升、社会培训、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布局不平衡、资源使用效率低等问题，存在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与劳动力市场衔接欠佳等问题，限制了其促进居民稳定增收作用，制约了劳动者通过劳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潜力。

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普及普惠

(一)起点和机会公平

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在于缩小个人发展能力差异，也就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逐步消除个人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普惠性增加人力资本能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根本途径就是教育和技术培训。

低收入者启动收入良性循环增长的起点在于教育，来自于教育起点和教育机会的公平保障。在不同层次的教育类型中，高等教育因为市场回报率差异可能扩大差距，但职业教育在促进普遍就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础教育更是保障个体机会公平的根本来源。尤其是，儿童早期教育不仅对防止未来贫困有帮助，同时也对社会平衡发展有保障作用。借由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儿童未来的机会平等就可以保证，这对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共享十分必要。

(二)设置最低教育标准

与西方社会主张的共享繁荣相比，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显然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它在追求结果平等的基础上，也特别注重机会和权利平等。在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共同富裕本身要有一定的高水平，内涵对象也要更加聚焦低收入群体。应树立底线思维，尤其是在教育均等化方面要设置最低要求，包括受教育权利的普及普惠，由此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目前我们在界定政府的基本责任方面稳步提高标准，力争全方位提升教育机会、教育质量与教育服务水平，做到更高水平的最低富裕标准。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做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同时我们也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逐步完善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终身教育和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培训服务，从可及性、富裕性和共享性出发不断提升最低标准，从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路径。

(三)财政投入均等化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涵，教育在促进保障基本权利普惠普及方面具有法定的底线责任。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仅是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

也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重要体现。推进基础性、普惠性和兜底性的教育财政保障，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目前各省义务教育毛入学率已经很高，教育普及率或入学率在95%以上，再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不大，真正需要提升的是教育质量，需要缩小地区间教育财政投入差异。应该说，质量提升而不是数量增加，才是当前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关键制约。在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国总体上已走过了教育制度可及性阶段，而过渡到教育经费投入富裕性和差异共享性阶段，在“学有所教”总体上基本实现后，就应当转向“学有优教”的新目标。

城乡义务教育差距与共同富裕

宗晓华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生活由温饱走向全面小康，教育从基本普及走向高质量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教育已然踏入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共同富裕要求教育既能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又要推进教育公平为共享发展收益奠定基石。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要求教育将人自身作为发展目的，实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同步提升。

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当前义务教育城乡不平等是制约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与之前发展阶段不同的是，经过多年对乡村学校的倾斜性投入，教育投入上的城乡差距已有显著缩小，但在教育质量上的差距仍然巨大。而且，这种质量上的差距与学校之外的复杂社会因素关联更大，这也是投入导向的教育政策在新的发展阶段边际效应递减的主要原因。

第一，城镇化使得乡村学校和学生数量快速下降，但乡村教育的城镇化是有限度的。

近20年间，我国人口的城镇化在加速发展，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64%迅速下降到2020年的36%。即使如此，目前居住在乡村的人

【作者简介】宗晓华，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电子邮箱地址：zongxh@nju.edu.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研究”（BFA170059）。

口仍然有 5.1 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第三大国美国的 1.5 倍还多。相对于快速的人口城镇化，我国乡村教育的城镇化的速度更快、程度更高。根据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2000 年，乡村小学有学校 44.0 万所，教学点 15.8 万个。2020 年，乡村小学只有 16.9 万所，教学点只剩 6.1 万个。乡村初中数量也从 2000 年的 3.9 万所下降至 2020 年的 1.4 万所。也就是说，短短的 20 年间，乡村学校消失了 39.3 万所，平均每年消失 1.9 万所，每天消失 51 所。随着乡村学校数量的快速下降，乡村学生也加速向城镇迁移。从 2000 年到 2020 年，在乡村小学就读的学生占小学总在校生的比例从 65% 下降至 23%，在乡村初中就读的学生占初中总在校生的比例从 56% 下降至 13%。当前，整个义务教育阶段乡村学校的学生占比不足 20%。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即使经济发达如美国这样的国家，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在乡村学校就读的学生仍占公立学校在校生数的 1/4 左右。虽然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但作为一个大致参照，说明当前我国教育城镇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未来继续升高的空间并不大。而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人口迁出和回流将会并存，未来乡村学校不会消失，也不能消失。

第二，乡村学校的“空心化”和城镇学校的“大班额”是教育城镇化带来的并发问题。

教育的城镇化速度之所以高于人口的城镇化速度，除了迁出人口的结构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乡教育质量的显著差距。我国大中城市的落户限制条件苛刻，而且房价和生活成本很高，因此农民进城主要选择在县城等小城镇。县级财政是我国四级财政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县级财政对转移支付和“土地财政”依赖很重。为了维持“土地财政”运转，吸引农民进城购房，县级政府对乡村学校进行“撤点并校”和集中优质教育资源于城镇具有很大的激励。从传统的统计指标来看，目前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程度已经很高，尤其是生均指标如生均面积、生均经费、生均资产、生师比等，很多地方乡村学校甚至超越了城镇。然而，这种均衡很大程度上是乡村学校“空心化”和城镇学校“大班额”所导致的“统计幻觉”。乡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乡村学校规模较小，教学点占到了 36%。从班级规模来看，2020 年，小学阶段 25 人以下的班级有 54.1 万个，77% 分布在乡村。46 人以上的大班额有 83.3 万个，90% 分布在城镇；初中阶段 46 人以上的大班额有 77 万个，89% 分布在城镇。

第三，城乡义务教育的质量差距显著，农村学生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

传统的统计指标已经难以反映城乡义务教育的真实差距。近期标准化测试的推广以及数据的丰富弥补了这一缺憾。2018 年 PISA 测试显示，在科学、

阅读和数学领域,京沪苏粤四地区城乡学生成绩差距非常大,城市学生成绩名列世界前茅,但乡村学生成绩远低于城市地区,甚至落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乡村教育质量的“短板”是拉低我国 PISA 国际排名的主要因素。基于 CEPS 数据的分析也显示,城乡学生认知能力标准化测验得分呈现明显的梯度落差。农村学生的平均得分与城区学生相差 0.57 个标准差,两者的差距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在城乡教育质量的显著差距的背景下,有条件 and 重教育的农村居民多数将子女送到县城或者中心城市,而留在乡村上学的往往是经济或文化上的弱势群体。根据 CHIP 数据估算,在农村人口中,低收入群体占 95% 左右,其中,相对贫困人口有将近 2 亿人。这些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不高,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居高不下,小学阶段占到了 35%,初中阶段占到了 68%。面对不利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如果采用相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即使农村学校投入更多的资源、教师付出更多的辛劳,农村学生也难以与城市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城乡义务教育质量上的差距,导致农村学生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机会的减少。当前重点大学录取学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步下降,教育的代际传递在加强,“贫困陷阱”问题变得日益严峻。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要缩小城乡义务教育结果上的差距,重点是要进行“底部攻坚”,在提高城市义务教育质量的同时,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政策改进乡村教育的质量,促进低收入群体子女的教育获得。对于未来如何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实质性地推进共同富裕,笔者提出如下政策思路。

第一,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振兴乡村教育,切实提升农村居民共享发展机会的能力。

从供给侧来看,在当前“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下,无论是乡村学校的“空心化”还是城镇学校的“大班额”,都是县域优质教育资源总体供给不足的表现,根源在于多数地区县级财力相对薄弱,缺乏供给能力,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有限,甚至存在“虹吸效应”。义务教育虽已经明确划为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但其支出责任在省以下政府间的划分并不合理。未来可考虑加大省级统筹力度,将教师基本工资作为省级财政的支出责任,并明确地级市政府在推进区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职责。从需求侧来看,由于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中等职业学校中农村生源占比较高,形成了事实上的城乡分流“双轨制”。即使是升入普高的学生,进入区域内重点高中的比例与农村人口比重也极不相称。向上流动机会的减少是农村家长教育期望较低的客观因素。未来必须坚定振兴乡村教育的政策方向,切实缩小城乡义务教育质量上的差距,同时调整普职结构,加大普高招生“指标到校”

政策对乡村学校的倾斜，尽快落实职教高考，打造职教本科，形成高质量、融通式的职教体系，为“寒门出贵子”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推进学校、家庭和乡村社区的联动，改变贫困文化，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

PISA 测试成绩显示，在 OECD 国家，很多农村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优于城市学校。这说明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条件和适合的教育，农村学生并不一定比城市学生表现差。然而，相比于生均经费、家庭收入等经济性因素，文化性因素对于解释当前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显得更加重要。乡村学生家长的文化素质、教养方式、教育期望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低收入群体和相对贫困人口占比较大。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一些弱势群体已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贫困文化，在教育上的主要体现是“读书无用”和“读书无望”观念。未来应主动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从经济扶贫走向教育扶贫，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具体地，要通过学校、家庭和乡村社区的联动，加强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改变农村家庭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家庭教养方式，改善弱势群体子女成长的家庭和社区环境，提高乡村教师和家长对学生发展的信心和期望。

第三，引导城乡学校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

伴随着城乡义务教育外部资源配置的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重心开始转向内涵建设，发掘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内生能力。在新的形势下，乡村学校要利用空间充裕、小班化、与大自然和农业生产劳动接近等特征和比较优势，走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例如，乡村学校可以从其根植的乡村社区和乡村文化汲取教育元素，并将其开发为特色校本课，建设学校特色文化，整合乡村社区资源，形成品牌优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共同体建设，在城乡学校共同体内部构建共同发展目标，创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机制，优化共同体组织结构，在文化和生态方面形成共生关系，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责任编辑：孟大虎 责任校对：孟大虎 刘泽云)